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真理与批判

——阿多诺《美学理论》研究

陈 波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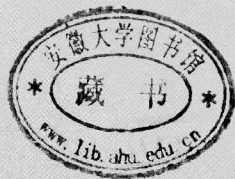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真理与批判

——阿多诺《美学理论》研究

◎ 陈 波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唐一丹
责任校对:许奕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理与批判:阿多诺《美学理论》研究 / 陈波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9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ISBN 978-7-5614-5495-4

I. ①真… II. ①陈… III. ①美学理论—研究 IV.
①B8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1649 号

书名 真理与批判
——阿多诺《美学理论》研究

著者 陈波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14-5495-4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张 7.75
字数 171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编委会

主任 杨泉明 谢和平

副主任 罗中枢 赵昌文 卿希泰 项 楚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骁	王挺之	王东杰	文富德	石 坚
左卫民	冉光荣	刘亚丁	杜肯堂	何一民
李天德	李 刚	陈爱民	杨天宏	杨 江
敖 凡	徐开来	徐玖平	唐 成	唐 磊
曹顺庆	黄宗贤	黄金辉	隗瀛涛	蒋永穆
潘显一	霍 巍			

丛书序

四川大学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之一。近十余年来，又经两次“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四川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 1896 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此后，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李培甫、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廖平经学思想曾经作为 19 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知识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20 世纪 2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俊、刘咸炘等人，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

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中，蒙文通由经向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力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探索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包容、开放并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四川大学开展。1922 年至 1924 年，吴玉章在此教授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考“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1924 年，学校设立了 10 个系，在人文社会科学 6 个系中，除了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文、历史、政治、经济 5 个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格局一直持续到 30 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

四川大学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和大学（以下简称“华大”）。作为教会学校，华大文科自始即以“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式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放异彩。1922 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及其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华大博物馆以“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艺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主持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有三：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跨学科的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这种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问题更为关注的学术风格，与国立四川大学更注重“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各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

俊、李植等蜀学传人主持中文系，加强了其国学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中国化。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如李安宅、郑德坤等成为新的学术领袖。

1935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积极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1936年5月，四川大学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的风气，也代表了四川大学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织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掌握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学方面，较之传统史学而言更注重问题导向和新材料之扩充的“新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并迅速成为国内史学界的重镇。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四川大学校内名师云集。张颐（哲学）、朱光潜（美学）、萧公权（政治学）、赵人儁（经济学）、徐中舒（历史学）、蒙文通（历史学）、赵少咸（语言学）、冯汉骥（考古学、人类学）、闻宥（民族学、语言学）、任乃强（民族学）、胡鉴民（民族学）、彭迪先（经济学）、缪钺（历史学）、叶麀（文艺心理学）、杨明照（古典文学）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在此设帐，有的更任教终身，为四川大学的文科赢得了巨大声誉。

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四川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另一方面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意识。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更使四川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学科如宗教学、理论经济学、敦煌学、比较文学、城市史等也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极高赞誉的学者，为四川大学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2006年是四川大学建校110周年，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学校决定设立“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四川大学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学术精品的出版。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四川大学学术大师的不断涌现和学术流派的逐渐形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 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代前言）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无疑是近三十年来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1979年，利奥塔发表《后现代状况》，对包括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在内的各种现代性理论进行“元叙事”批判。尔后，1980年9月，哈贝马斯在荣获“阿多诺奖”的致辞中，以“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计划”为题，在某种意义上对利奥塔进行了回应。1984年，哈贝马斯出版《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强力参与后现代之争，而诸如杰姆逊、罗蒂、吉登斯等当今欧美学术明星们也都积极参与，这成为当今西方学术的一大景观。在这场争论中，哈贝马斯的声音特别值得我们重视^①。的确，从学理层面来看，哈氏对思想史清晰的清理、对现代性规范根基的建设性重建，无疑会有强烈的吸引力。

然而，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指的是把西方现代社会历史以“现代性”为中心概念加以主题化的反思批判。所谓哲学探究，对现代性而言，即是“自我理解”、“自我确证”的问题，为现代性确立既不同于古典也不同于神学的新规范。直到18世纪末，这个问题才变得“十分突出”，并由黑格

^① 正如马丁·杰伊所言：“在有关从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的热烈论争中，哈贝马斯的介入注定要引起最广泛的讨论，他的成就无疑在于把论争的水准提高了几个层次。”

尔加以主题化，使之达到“反思性的自我意识”^①。

实际上，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在近代哲学（从后期经院哲学直到康德）中就已开始，即西方近代确立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以主体性的本体论奠基为基础，现代性规范体现为主体性原则，表现为笛卡尔抽象的我思主体和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康德虽然成功地界分了现代的不同知识和实践的领域，现代科学技术、道德法律及自律的艺术的确构成了现代文化形态的划分，但在黑格尔眼中，分离就意味着分裂、意味着异化，新时代的规范基础尚未以统一的理性方式得到奠基。而这正是黑格尔在理论上面对的状况：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是否能够作为确定规范的源泉？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条原则尽管绝对能够塑造出自由的主体和进行反思，并削弱迄今为止宗教所发挥的绝对的一体化力量，但它并不能利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一体化力量”^②。于是，现代性的真正一体化力量来源于何处，现代性规范如何奠定，就成为现代性的首要问题。由于启蒙理性最初是建立在主体性之上的，而主体性的弘扬又导致分裂，所以对现代性第一个哲学家黑格尔而言^③，对唯心主义主体性理性批判就成为前提，而现代性的理性规范重建就成为哲学的时代课题。

黑格尔以降，围绕着理性批判和理性重建就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论域”。源于马克思传统的批判理论对生活世界分裂的物化论批判，的确尚有理性内部辩证法的对立面扬弃的选择，但关涉自身的绝对理性批判却从根本上堵死了回复理性的可能性。于

① 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②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③ “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是，回到被遗忘的原始存在的审美经验或者根本拒绝现代性规范问题的方式，也就成为有关现代性后果的哲学反应方式。在现代性发展到“生活世界已被殖民化”（哈贝马斯语）的今天，如何在保有现代性成果的同时超越工具理性和极权主义的理性误用，就成为新一代批判理论家的历史任务。而这一任务的理论完成的前提则在于批判由之可能的规范基础以理性名义的当代重建。

一、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性的确证

1. 现代性规范价值的确立

正如哈贝马斯指出：“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① 发现新大陆，拓展了欧洲人的地理空间概念，其社会和政治意义在此不作讨论。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则是两个对西方现代性文明至关重要的文化事件，其中突显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在启蒙运动中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洪流，时至今日仍势不可挡。

对新文化的探索，当时尚不能完全采取创新的形式，改革者们采取转向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使之复活和重生。文艺复兴的精神实质包括对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的确认，反对专制，维护思想自由和批判自由的权利，重新发现人性。这就是人文主义。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一批“人文主义者”开始了对人的意志自由的强调，并表现出乐观情绪，“也就是声称人总是有可能发挥他们的道德力量来战胜命运女神的威力”^②。

德国的宗教改革是在当时一个重要领域，宗教信仰领域——为争取精神自由所进行的运动。当然，新教改革的直接目的是纯

①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② 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商务印书馆，第160页。

宗教的——灵魂的救赎，但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它的文化后果。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研究了宗教改革中体现出的伦理观念（作为道德的基础）是怎样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动力基础的。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经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①。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并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于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②。

启蒙运动体现出了启蒙精神，而启蒙精神最典型地包含了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规范。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指出：“对这种启蒙来说，所需要的就是自由。这里所谓的自由——即在一事物中公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③ 18世纪是对理性、进步、自由、解放等价值进一步弘扬并加以世俗化的世纪。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中写道：“当18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达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④ 18世纪法国最后一位启蒙哲学家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表明了启蒙历史观：历史乃是人类理性发展过程，进步是理性发展，因而是人类解放过程。随着大革命的胜利，理性、自由、平等、公正、博爱、解放，部分地达到了

①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页。

②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页。

③ 见《哲学译丛》1991年第4期。

④ 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目的。^①

作为一种新的时代意识的现代性虽是从现实中来，但它一经理论化而成为概念，则又具有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色彩，主体的自由与解放成为现代性价值理念的乌托邦母题。戴维·哈维曾指出：“虽然‘现代’这个语词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但哈贝马斯所称的现代性的‘规划’却在18世纪期间才进入到焦点之中。就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自身而言，这种规划就是一种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根据它们的内在逻辑去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自主的艺术’。这种观念就是要把许多个人自由地和创造性地工作所产生的知识的积累，运用于追求人类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丰富。科学对自然的支配使摆脱匮乏、愿望和自然灾害肆虐的自由有了指望。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确保了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专横地利用权力和我们自己的人类本性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来。只有通过这一规划，全人类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特质才可能被揭示出来。”^②

2. 启蒙现代性的主题化反思论证

上述种种思想都是关于新时代人类生存的论说，并首先由某种“历史哲学”加以表述。^③在此，我们不考察这一“历史哲学”的内容和特征，而是关注于对现代性核心价值规范的哲学论证，即以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贝斯特和凯尔纳指出：“从笛卡尔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

① 关于启蒙，更详细的文献参见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页。

③ 哈贝马斯认为：“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概括了历史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主题。”参见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以重建。”^①

现代性的哲学确证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反思性，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先前的哲学特别是康德的先验哲学，在主体性原则基础上奠定现代性规范的方案是有缺陷的。因为在知性思维框架中，由理性保障的现代性必然产生内部分裂（如康德的“二律背反”），于是，必须批判对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有限的知性理解，必须重建现代性的理性规范，从而使之取代宗教充当现代性整合的一体化力量。

黑格尔首先发现，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它体现在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方面。就历史而言，主体性原则体现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而主体性原则在哲学中表现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自我意识。康德通过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判断力分别确立了人类三重世界关系的合理性目标（真善美），并划分出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在康德那里，纯粹的自我意识成为反思性关系，成为认识论的基点，以此解决三大《批判》各自的奠基问题，先验反思成为主体性原则在哲学认识论中奠基的方式。哈贝马斯认为：“康德关于形式分化的理性概念恰恰意味着现代性理论。现代性是以拒绝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为典型形式的实体理性，并相信程序合理性以及它能给予我们对客观知识、道德实践的智慧 and 审美判断等三个领域观念的可信性的能力为标志的。”^② 而正是由于现代

^① 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 哈贝马斯：《道德意识和交往行为》英文版，剑桥MIT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化的实际进程，即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进程”实际上遵循的是以“计算”为导向的形式合理性，才出现了带有批判性的物化主题，这是后话。

开启现代性反思性哲学话语的契机是对主体意识哲学的批判，这就是黑格尔面临的基本问题，即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是否能够作为确定规范的源泉？哈贝马斯认为，对黑格尔来说，主体性原则“尽管绝对能够塑造出自由的主体和进行反思，并削弱迄今为止宗教所发挥的绝对的一体化力量，但它并不能利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一体化力量。”^① 具体说来，“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达到高潮的启蒙时代，不过是建构起了一个理性的偶像。它错误地把知性或反思放在了理性的位置上，并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② 问题于是变得很清楚，现代性自我确证的主体哲学论证策略归于失败。黑格尔指出：“康德这种哲学使得那作为客观的独断主义的理智形而上学寿终正寝，但事实上只不过是把它转变成为一个主观的独断主义，这就是说，把它转移到包含着同样的有限的理智范畴的意识里面，而放弃了追问什么是自在自为的真理的问题。”^③

对黑格尔而言，对理性的主体性论证策略是错误的，因为“主体性不仅使理性自身，还使‘整个生活系统’都陷于分裂状态”。所以，首先应进行主观唯心主义批判，从而真正确立现代性的规范，对哲学而言，就是重新以理性来奠定现代性的基础。虽然黑格尔提出了一套最为宏大的现代性哲学话语，然而，其理论论证语境仍是反思哲学框架，也就是说，是在反思哲学内部来克服反思哲学的知性形而上学，采取的方式是“根据一种启蒙原

①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②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8页。

则自身内部的辩证法再去阐释现代的批判概念”。^①

对黑格尔来说，必须假设一个真正的、绝对的一体化力量，作为理性的真正体现者。如同历史上任何思想大家一样，黑格尔的理论也有一个发生学过程，或有一个各种策略的选择问题。众所周知，黑格尔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图宾根、伯尔尼、法兰克福及耶拿等时期，我们在此不详述。哈氏对黑格尔早期思想有一个提示，“黑格尔在他早期著作中考察了理性的和解力量，而这种理性是不可能从主体性中推导出来的”。^②于是，主体性批判方案首先是用“爱和生命”中表现出来的主体间性的一体化力量，来反抗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权威。当然，哈贝马斯不无遗憾地评论道：这种思想转向本来可以促使黑格尔从交往理论的角度弥补主体哲学中理性的反思概念，但黑格尔并没有走上这条路。黑格尔很快就抛弃了这一方案，因为他把伦理总体性与原始基督教和古希腊城邦伦理联系在一起，而他认为这是不符合现代精神的。^③

还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与谢林、荷尔德林等朋友们还试图发展一种对现代性分裂的审美的解决方案。在《原始体系纲领》手稿中，黑格尔提出这样一种观念：艺术作为面向未来的和解力量。而审美的目的和功能是帮助理性的宗教深入人心，从而真正实现伦理的总体性。实际上，在黑格尔之前和之后，对审美抱有过度的希望已经成为一种传统。1795年，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谢林在其晚年、荷尔德林一生都有类似的思想。此前关于古典艺术的规范性地位的争论（“古今之争”），就已涉及

①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②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③ 哈氏认为：“这或许就是黑格尔为何没有深入挖掘他早期著作中的交往理性的原因，也是他在耶拿时期从主体哲学角度抛弃古代基督教模式，发展绝对概念的缘故。”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现代性自我确证的问题。然而，黑格尔很快意识到，艺术只是绝对把握自身的感性直观形式，因而艺术本身是有局限的（这在现代的浪漫艺术中表现为主观的伤感与颓废），艺术的理想（也是理念的理想）应该在艺术之外的更高层面上（比如哲学）实现。

改革后的宗教（如新教）如艺术一样都是有局限的，而局限的来源也正是对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作了片面的因而是强制的主观主义理解。于是，黑格尔的最终方法就是超越康德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用一种具有绝对力量的理性观念取而代之。《精神现象学》提出了一个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命题“实体即是主体”，主体（作为现代性规范）的实体性保证了其绝对性。然而，实体性主体必须要自我确证，而这种确证必须在自我存在的过程中实现，作为现代性推动原则的反思也必将自我确证的动力，于是，实体的自我确证表现为辩证地展开。在绝对自我运动的过程中解决现代性的规范论证问题，用主体哲学的手段来克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艺术、宗教以及一切文化建构就以被扬弃的环节的形式包含在绝对精神之中，而在这种意义上，绝对精神也并非某种实体。哈贝马斯中肯地指出：“他的绝对概念克服了所有的绝对化趋势，仅仅把自我关系囊括一切有限的无限进程当做绝对者而保持下来——黑格尔这样做，其目的是要把哲学作为一种一体化的力量，克服由于反思本身所带来的一切实证性——进而克服现代的分裂现象。”^①

黑格尔构造了一座现代性的完整思想大厦，然而用理性概念建构的，本质上是一种“解释世界”（马克思）的哲学话语系统，它一经建构完成，就立刻呈现出封闭性的实证特征。绝对理性的哲学一旦自我实现成为体系，就会使自己实证化（即片面化），从而耗尽内部辩证法的批判动力，“所以，黑格尔的哲学满

^①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